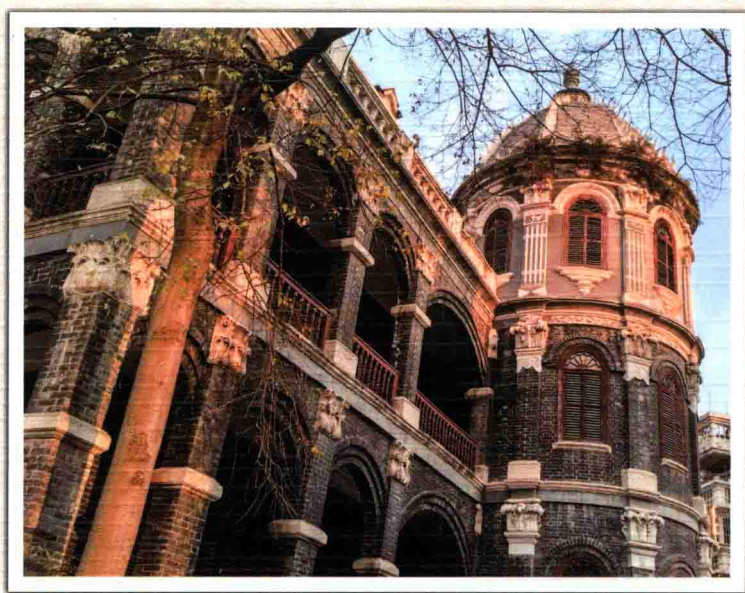


赵明和◎著

我的美国表姑

“圆顶房”下的今人与往事



My American Aunt

上海三联书店

我的美国老师

我的美国老师

“国殇”下成长的少年



“国殇”下成长的少年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美国表姑：“圆顶房”下的今人与往事/赵明和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

ISBN 978-7-5426-6161-6

I. ①我… II. ①赵…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6174 号

我的美国表姑

——“圆顶房”下的今人与往事

著 者 赵明和

责任编辑 钱震华

装帧设计 汪要军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印 刷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5

书 号 ISBN 978-7-5426-6161-6/I · 1354

定 价 5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渊源	1
第二章	期待	15
第三章	碰撞	27
第四章	回家	43
第五章	“我只做好事”	61
第六章	叔父	75
第七章	路口	95
第八章	孝女	113
第九章	表兄	127
第十章	上海纪念会	157
第十一章	萝萝	173
第十二章	“血的关系”	191
第十三章	改变	207
后 记		223

第一章

渊 源

1993年，隆冬的早晨。

父亲把一封美国来信递给我：“保志宁的女儿要从美国到香港开会，然后来贵阳。”顿了顿，又说：“她在联合国做事，从没来过中国。按辈分是你表姑，圆顶房的事，以后由她来处理。保志宁老了，跑中国困难了。”

保志宁，王伯群夫人，父亲称呼她大舅妈。世人对她最熟悉的一个标签是“大夏大学校花”，人们把她与林徽因、陆小曼等并列为“民国十大校花”。至今，后人仍会津津乐道于她与王伯群的婚姻，不仅因当时王伯群是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还因俩人的年龄相差了26岁。其实，相对于世事无常的人生，这些标签和热词都不重要。她骨子里十分自立自强；出身外交世家加上勤奋用功，所以她的英语很棒。在王伯群辞世后，真正重要的这两样成了她漂洋过海到美国站稳脚跟的立身之本。

“圆顶房”是王伯群和保志宁在贵阳时的故居，位于护国路，现是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1985年保志宁回中国，与我父亲等老一辈重聚，那以后他们为圆顶房的种种事宜信件来往密切。现在，“圆顶房的女儿”又要来了，她会否像她的校花母亲一样娴雅美丽？

她有多大呢？我看完信后问。父亲掐指算着：“她是个遗腹



1945年时的保志宁



1943年时的王伯群

子^①。王伯群辞世后才出生，四十八上下，比你大几岁。”接着又说了让我颇觉诧异的话：

“她一直独身，没有结婚。”

信内附有摄于台湾的何应钦九十寿辰相片，他在九十八岁时辞世，父亲称呼他三姨父。时值他辞世六周年，国外及台湾的亲戚在进行纪念，保志宁舅婆以为父亲没有此相片，所以又寄了来。

曾经叱咤风云的这位大人物，头戴寿星帽，傍着生日蜡烛的烛火在悠然微笑。望着相片父亲说，“等你表姑来了，如果我身体情况许可，想陪她去趟兴义，看看她家和何应钦家的老屋，也看看我外公刘显潜的老屋。”

父亲说完沉默了。我也沉默了。

潜意识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特感觉，正由远而近袭来。这一早晨谈的话，触及我背后的一个大家族。多少年来，我一直小心地

^① 此处参见本书第120页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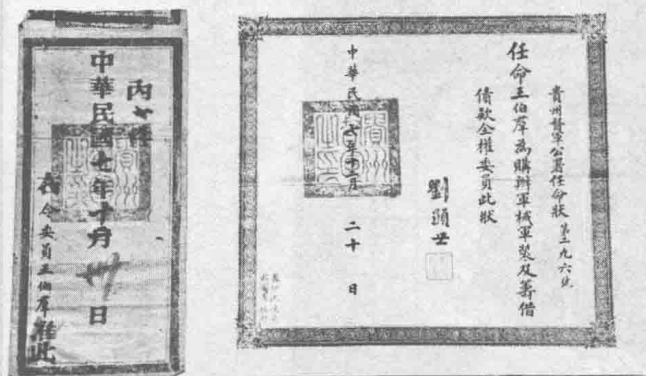
兴义泥幽何应钦故居

将其置于脑后,不愿去面对。而刚才提到的其中几位主要人物,尽管他们早已离去,现在却因为将到中国来的表姑,他们似乎也会紧跟她的脚步,一个个地由背后,绕到眼前来……

父亲的外公刘显潜,与刘显世是亲堂兄弟。现在贵州兴义著名的“刘氏庄园”,是当地一大旅游热点,前去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那就是刘显潜与刘显世的故居。亲堂妹刘显屏,本人是兴义刘氏家族的一个普通妇女,但她的子女中,长子名王文选,即王伯群,次子名王文华,即王电轮,行三的女儿名王文湘,长大后适何应钦,成了何夫人。

说起何应钦与王文湘,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多次讲过的他们的家庭。他俩自结婚后感情就很好,但一直没有生育,何虽位高权重,且一表人才,却既不同意纳妾,也从不在外拈花惹草,于是过继了兄弟何辑伍的女儿何丽珠为女,一个家庭就这样尽享天伦和谐稳固地直到俩人终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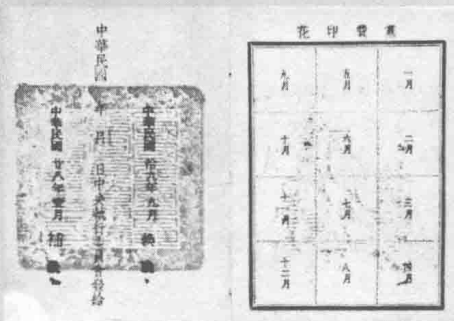
他们都出生在贵州兴义。刘显潜刘显世的老家在下午屯,王伯群老家在景家屯,何应钦老家在泥幽。



刘显世给王伯群的任命状



王伯群的证件之一



王伯群的证件之二

就曾经做过的“官衔”来说，刘显世曾几度出任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潜为滇黔边务督办、游击军司令，代理过贵州省长；王伯群任国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部长；王文华在护国运动中任护国军右翼东路军司令，护法时被孙中山任命为黔军总司令；至于何应钦，是国民党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军事首脑，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长、军政部长等要职。

这个在近现代史上对贵州、对中国西南、乃至对全中国产生过至深至远影响的家族，当我在这里写出他们的名字时，内心仍然百味杂陈。看似“显赫”的这个家族，没带给我任何“福祉”，却从记事起就“自然而然”地加给我无尽的灾难。换句话讲，他们当年越是“显赫”，带给我的灾难就越是深重，造成心灵上烙印般的创伤。因此我对这个家族一直不大愿提及，不大愿面对。

这样的家族背景加上“海外关系”，从 1949 年后就让父亲一直受牵连，到了“文革”时期让我们一家被整得濒于家破人亡。何应钦、刘



1945年，何应钦（右）在受降仪式上

显世、刘显潜中任何一个名字，在当时都是一个梦魇，一个黑暗的深渊。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惨烈的社会环境下，别说与他们都是亲戚，只要随便与其中一个沾亲带故，都会背上沉重无比的黑锅，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有时直接就能置人于死地。”

父亲在“文革”中被关牛棚，除了每天放牛砍猪草写检查，随时会被拉出去游街批斗。其中一次是被押着上台，然后被命令弯腰九十度对着群众。这时跳上来一个中年男人，指着父亲骂道：“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就是你的三姨夫何应钦出面与日本人签定的！何应钦是个大卖国贼，你也是个卖国贼！打倒卖国贼！”说着说着就对我父亲又是拳打又是脚踢。这时蹿上来两个人，其中一个对着父亲连骂带打几下后下去了，另一个上来后对着我父亲脑袋先是一拳，然后一脚狠狠踹去，父亲站立不稳，往一边倾倒，先前的那个男人又一脚把他踹过来……台下，口号声雷动：“打倒卖国贼！坚决打倒卖国贼！”

《何梅协定》是否存在，是“子虚乌有”，是“有名无实”，亦或是另有说法，一直存在争论，此乃史上一桩公案。但在那个年代，与《何梅

协定》扯上边，与卖国扯上边，直接是会要人命的呀！父亲本人从不对我说起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多年后仅有唯一的一次，父亲对我回忆：“……那时心想完了，再上来几个这样打，我这条老命，可能就交代在那天了……”父亲不想我难过，想尽量轻松的讲，这点他基本做到了，他的口气里甚至还带一点点嘲弄。做不到的是他的眼神，心灵深处的屈辱与悲愤，让眸子深处闪着泫然泪光，想隐忍也没法隐忍。而我知道，我当时的眼睛里，也只有和他一模一样的，想对他掩饰也掩饰不了的屈辱与悲愤的泪光。

想起堂堂国家主席刘少奇，竟会被打成所谓“叛徒、内奸、工贼”，残酷迫害致死。他最后栖身的地方是一个废旧的黑暗锅炉房，当遗体被拉出来时，竟连一张能完整的盖住他曾经伟岸身躯的，长一点的破席都没有，以致他枯瘦的双脚还裸露在那领短了半截的破席之外……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被揪斗后几个人抓住他从楼房的窗口扔了出去……在这样惨绝人寰的“文革”环境中，批斗会上如果活活打死一个普通老头，不就如掐死只蚂蚁一样？我至今感谢那天在台下的群众。或许在贵州安顺这样的小城，世风与人心相对古朴，不太易被煽动得癫狂而群体作恶，因此那天除了那两三人，其他人是有所克制的，没有上台施行暴力，父亲侥幸躲过一劫。

父亲已然成了“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里通外国的特务”，再加上他的先辈刘显潜刘显世和散居海外及台湾的亲戚们，我自然就背上了黑得不能再黑的黑锅，初中毕业就被“内定”为不能继续升学的另类，更让知青时代成为黑七类子女的我在饱受歧视和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虽经种种努力仍因“家庭政审不过关”，让回城工作成为泡影，百般走投无路中差一点就去卧轨自杀。

父亲也曾几次想到去死，结束这种非人的生活。他能从“文革”

中活过来，只因为母亲，不管怎样的政治高压和严重后果，她对父亲始终如一，这从精神上给予了他信心，还有就是他身体比较强壮，总算支撑他熬过了种种苦难。而1971年那个凄风苦雨的早上我没去卧轨仅仅出于一种偶然。否则，我们早已被整得家破人亡。

如今，“海外关系”们或通过各种渠道来往联络，或像舅婆与表姑等亲身回国亮相，当年一提起就谈虎色变的“两刘一何”，他们的故居，经政府修葺与保护，由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提升到现在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显潜刘显世的老屋，除以“兴义刘氏庄园”闻名外，因是全国最大的屯堡式建筑群，有关方面认定具有较高历史、科学、艺术及研究军阀史的价值，还将收集完善相关资料，建“兴义刘氏博物馆”……无论眼前如何地热闹，我们，不过是从浴火中得以生还。捂着内心的伤疤，淡然旁观，如此而已。

只要“家庭背景”不再给人予伤害，只要不再背负沉重的“原罪”，足矣！因此，如果不是为了亲自陪四十八年来将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表姑，父亲也根本不会说从凑热闹的角度回去看老屋。

我心深处有个不大不小的“结”，我的外公周素园，与我父亲的叔公刘显世，是政治上不共戴天的宿敌。

外公是贵州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1年11月，贵州自治学社长期酝酿的，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武装起义已接近成熟。当张百麟、周素园、乐嘉藻等冒死进入贵州抚署，劝告巡抚沈瑜庆顺从民意，和平交出政权时，刘显世正带着部队，在沈的密电下兼程赶来贵阳增援、镇压。

当时，全国及全省革命形势高涨，贵阳城内军民都支持革命，连巡防卫队也表示同情革命。沈瑜庆见大势已去，不等刘显世赶来，被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兴义刘氏庄园



刘氏庄园陈列馆正门



庄园内的家庙



庄园内的刘显潜故居督办府



庄园内的忠义祠

迫向自治学社交出了政权，贵州辛亥革命兵不血刃取得了胜利。

此时，刘显世带着部队才赶到平坝，闻听不敢再前进，退至安顺驻扎。刘显世此时考虑，想返回兴义，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随行的前队官、外甥王文华（即前提到的王伯群胞弟）进言：“……贵州光复，乃顺时应人之举……若回兴义，显示反抗，必遭失败，……当兹光复伊始，需才孔急，必获录用……”刘显世依言假惺惺写信给张百麟，善良的革命党人中虽有人反对，但经过争议，最终刘显世等被允许入城。之后刘显世被任用为枢密员兼军事股主任，所带的徒手兵也一律发械武装。

刘显世之进入贵阳，不啻于引进了一只阴险的“笑面虎”，为贵州辛亥革命埋下了极大隐患。同时，也成为刘显世本人从一个盘踞兴义的土豪，此后一跃成为割据全省的军阀、掌控全省政治经济命脉的省长的重要转折点，这是后话。

在以张百麟、周素园等为首领导下，推翻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成立贵州大汉军政府后，刘显世等表面表示忠诚，拥护大汉军政府，暗地里却伺机反扑。1912年2月2日，立宪派主要人物发动政变，杀害了黄泽霖，张百麟侥幸逃脱，之后更勾结唐继尧带领滇军以阴谋手段进入贵阳，猛攻都督府，并血洗贵州军民。大汉军政府被彻底颠覆，贵州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彻底葬送。紧接着，包括刘显世在内的群寇协谋，逮捕和诛杀自治学社成员，以非常手段消灭异己。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二二事变”和其后的“亡黔”时期。

军政府被颠覆的二十多天后，久病的外婆辞世，撇下一子三女，当时，“长方毁齿，幼者犹在襁褓，”而立宪派中的郭重光等人已迫不及待要捕杀周素园等自治学社成员。外公只能将儿女暂托与人，借道四川逃离贵州。几个幼儿常陷入完全无人照拂的凄惨情景，外公



壮年时期的周素园



周素园与女婿赵发智摄于毕节（1946年）

的长子俊群，就因没有大人照料，被滚烫的汤水烫成重伤，不治夭折。

流亡期间，外公将云流星散在北京的革命同志组织成“黔人冤愤团”，奔走呼号，伸张正义，并起草了《黔人冤愤团宣言书》等等文件，为贵州革命派鸣冤。后被唐继尧向袁世凯密告为革命机关，被袁世凯下令通缉。那些年，外公一直是处于被袁世凯、唐继尧、贵州立宪派等的多重迫害下，曾数度濒临虎口。

在“河山兮破碎，身世兮飘零”中，我那当时仅一二岁的母亲和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姨母们，是在1914年时，被外公设法接到身边的。她们和外公一起，过着时时面临监禁捕杀、追捕和逃亡，再加上穷困潦倒，濒于断炊的生活，后来又经历了再次丧母的哀痛……

仅比我大两岁却十分成熟的家兄，在很早就对我提起这种来自母系方面亲人和来自父系方面亲戚政治上的严酷对立，让还很懵懂的我一直困扰于自身既是周素园后代又与刘显世有亲戚的身份。这

种困扰今天可以大致表述为,曾经的尖锐对立,不知当初他们怎样对待我父母的婚姻?对立的双方在已有儿孙辈联姻的情况下怎样共存共处?父母在其中很为难很为难吗?当时没有能力捋清到这种程度并去讨教父母,在一个幼稚女孩单纯的内心,此成了心中的一团阴影和一个模模糊糊的“结”。